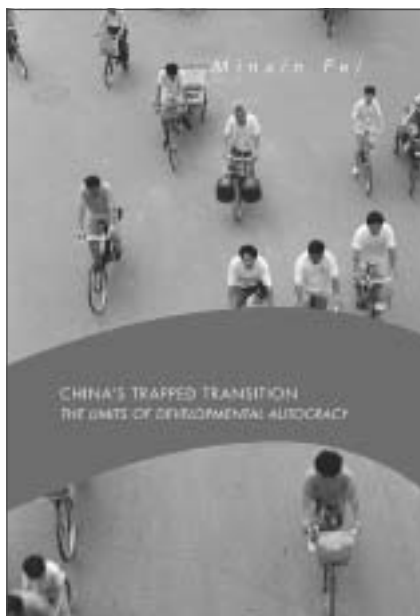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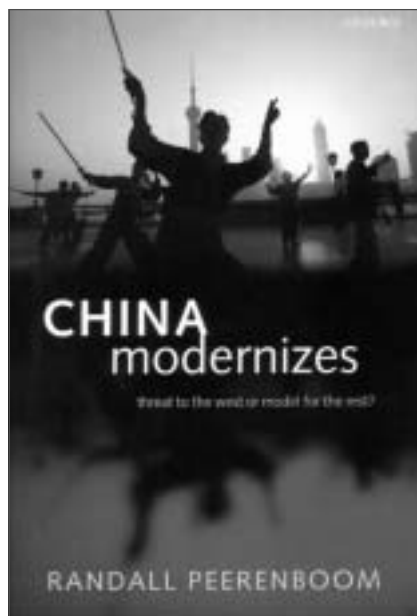
中國現代化的「顏色」： 裴敏欣的《中國蹣跚轉型》 VS. 帕倫勃的《中國現代化》

● 祁懷高



Minxin Pei,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近年來，隨着中國的快速崛起，西方國家關於中國現代化的著作開始大量湧現，相關學者也就如何評價中國現代化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Randall Peerenboom, *China Modernizes: Threat to the West or Model for the Re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其中，裴敏欣的《中國蹣跚轉型：發展型威權政府的局限》(*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和帕倫勃

近年來，隨着中國的快速崛起，西方國家關於中國現代化的著作開始大量湧現，其中，裴敏欣的《中國蹣跚轉型》和帕倫勃的《中國現代化》是影響較大的兩本學術著作。

* 本文的寫作得益於上海復旦大學郭定平教授的博士生課程《比較政治學》的課堂討論。筆者要感謝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的劉騫博士對本文寫作的幫助。

裴敏欣和帕倫勃對於中國現代化的看法如同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裴著對中國的崛起和發展持「總體批判與前景悲觀」的態度，而帕著對中國持「總體積極與謹慎樂觀」的態度。

(Randall Peerenboom) 的《中國現代化：對西方的威脅還是其他國家的榜樣？》(*China Modernizes: Threat to the West or Model for the Rest?*) 是影響較大的兩本學術著作 (以下簡稱裴著和帕著，引用只註頁碼)。

兩位作者對於中國現代化的看法如同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裴著對中國的崛起和發展持「總體批判與前景悲觀」的態度。如裴敏欣在該書引言部分提到：「中國問題的根源是沒有政治改革故而缺乏限制『分散性劫掠國家』(decentralized predatory state) 的制度手段，共謀性的腐敗將會廣泛擴展，政治治理也將會惡化，所以中國的改革是難以為繼的，中國的前景是暗淡的。」(裴著，頁11-15) 而帕著的立場則與之相反，對中國持「總體積極與謹慎樂觀」的態度。正如帕倫勃在引言中提到，他希望將中國置於一個更廣泛的比較語境下，重點關注中國與同等收入水準的國家相比，做得有多麼出色 (帕著，頁10-22)。

一 裴敏欣的《中國蹣跚轉型》：中國現代化危機重重

裴著認為中國的轉型面臨重重危機。作者在第一章中構建了一個中國轉型的理論框架，採用了民主化、經濟改革和國家三個方面的理論文獻解釋轉型陷入困境的原因，特別分析了劫掠型國家理論 (the theory of the predatory state) 以及為甚麼在轉型過程中會出現分散性劫掠。初步結論是：

儘管後極權主義政權 (post-totalitarian regime) 有著支持市場經濟發展的論調和政策，但很可能會退化到劫掠型獨裁政權。劫掠型獨裁政權無法維繫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但開放的民主最終將會出現，這並非政權自身的選擇，而是長期腐敗、治理不善和制度衰退導致的突然危機的結果。(裴著，頁44)

作者在第二章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為甚麼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沒有走向民主？作者分析了中國統治精英對於政治改革的觀點和政策，評估了1970年代末期以來中國發生的各種制度改革的影響，認為後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改革可以被解釋為機會主義的 (choice-based) 而非結構主義的 (structure-based)。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一部分領導人的政治改革理念是非常狹隘與功利的，政治改革只能被允許服務於黨保持其統治地位與實現經濟改革的目標。雖然以趙紫陽為代表的中共黨內自由派的改革被認為更接近民主，但隨着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自由派的失勢，民主派的改革主張在中國已經不可能得到實施了。

作者在第三章分析了中國漸進改革的陰暗面，認為中國經濟漸進改革的政治邏輯在本質上是為了維持統治集團的生存。在此邏輯的支配下，經濟改革不可能損害統治集團在關鍵的經濟部門獲得和分配租金的權力，這就注定了所有用來增加這些要害部門效率的改革措施都只是片面的、妥協的，最終也會是無效的。作者選取了中國的國家糧食收購體制、電信服務體制和銀行

體制作為分析案例，試圖驗證第一章提出的一個假設：在制度生存、漸進改革、不斷增長的隱形成本以及持續的無效率之間有着潛在的聯繫。同時也詳細解釋了為甚麼漸進改革不可能使中國的要害經濟部門市場化。

在第四章中，作者着重分析了中國為甚麼會在經濟轉型時期形成一個分散性劫掠國家形象，即所謂「地方性黑手黨國家」(local mafia state)。作者認為中國形成分散性劫掠國家的制度因素有如下四個方面：一是分散化的產權結構，中國的財政分權驅使地方政府採取掠奪政策和行為，導致大部分預算外收入被地方官員浪費和侵吞；二是中央監控能力下降，加上制度無效和社會監督缺失，導致黨內和政府內官員濫用公共資源的情況相當普遍；三是政府官員以各種方式把他們手中掌握的權力兌換成金錢，這些方式包括將國有資產私有化、官商兩棲、在國外定居和投資等；四是意識形態規範的褪色。作者還進一步分析了1990年代以來，中國呈現出地方性黑手黨國家的形態，表現為組織化犯罪因素的介入和地方要員的相互勾結。作者認為，中國轉變成為一個分散性劫掠國家對中國的政治體制、經濟發展、國家—社會關係、民主化都有複雜的影響。中國平穩而漸進的民主轉型前景非常暗淡。

作者在第五章中分析了中國處於困境中的轉型所導致的後果，即大量出現的治理赤字 (governance deficits)。治理赤字表現為國家能力的銷蝕和執政黨政治動員能力的

下降。自1970年代末以來，中國政府在提供公共衛生、教育、公共安全、環境保護等公共產品方面表現不佳，體現了國家能力的銷蝕。同時，市場化導向的改革損害了共產黨的組織體系得以構建的基礎，導致了執政黨紀律和制度體系的破壞，使得執政黨政治動員能力和整合能力下降。作者還以國家和社會之間日益上升的緊張關係為視角，揭示了中國在一黨體制下面臨的三個嚴峻挑戰：一是執政黨在農村地區的管治衰退，以及農民的不滿和群體性事件的大量增加；二是失業率居高不下；三是制度崩塌，當前中國的信訪、行政訴訟、地方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媒體這四種公民與政府溝通的管道中，沒有一個制度是運作良好的。

在結論部分，作者討論了中國轉型經歷的理論和政策涵義與前景。作者自問自答了這樣一個問題——中國如何走出轉型的困境？作者提出了三種可能的出路：一是假設國家在困境中的轉型具有自我破壞的動力，那麼新威權政體 (neauthoritarian regime) 將很快耗盡它的經濟和政治生命力；二是政權的崩潰；三是組建地域性的推進改革的聯盟，凝聚地區改革派精英和形成有益於改革的社會壓力。關於第三種出路，作者認為中國地區改革精英主動推進改革將導致中國國家層面的治理分歧，因為某一些地區將通過改革竭力擺脫轉型的困境，而其他地區轉型的困境將繼續存在或情況變得更糟 (裴著，頁210-11)。總之，作者認為無論哪一種出路，中國的轉型都將困難重

裴敏欣認為，中國轉變成為一個分散性劫掠國家對中國的政治體制、經濟發展、國家—社會關係、民主化都有複雜的影響。中國平穩而漸進的民主轉型前景非常暗淡，只有在現有政權崩潰時才會有成功的民主轉型。

重，前景暗淡，中國只有在現有政權崩潰時才會有成功的民主轉型。

二 帕倫勃的《中國現代化》：中國現代化成就斐然

與裴敏欣的看法不同，帕倫勃認為中國的現代化雖稱不上完美，但的確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作者首先分析了現代化的兩種發展路徑：一是經濟優先，以經濟發展帶動社會其他方面發展；二是民主政治優先，以制度帶動經濟社會發展。二者相比較，作者傾向於前者。他認為後者往往被視為服務於西方國家的對外政策，而且並不能如西方領導人所鼓吹的那樣，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諸如腐敗、政治低效等難題（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貧困問題），這些問題最終只能通過經濟發展來解決。

接着，作者談到中國公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問題。作者認為，面對一個日益成長的、多元化與利益分歧的市民社會，中國政府有三種路徑可以選擇：一是繼續對社會保持壓制與控制；二是解除限制，擁抱民主；三是予以有選擇的限制，既在總體控制的同時，又在某些領域逐漸地拓展公民權利與政治自由。作者認為第三條路徑在中國官方與民間都佔據了主流地位，而他本人也對這一路徑持肯定態度。

關於中國崛起以及當前國際社會對於中國的態度，作者認為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是一個日益崛起的大國，需要

贏得世界的尊重；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中國是一個野蠻的、不合時宜的威權國家，是對地區穩定和自由民主發展模式的威脅。哪一個才是真正的中國面孔？

帕倫勃認為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將中國的經濟、政治、法律體系和公民政治權利等內容置於發展中國家，而不是發達國家的參照系中來比較。也就是說，他將中國的現代化績效與其他中等收入國家相比，而不是拿中國與美國和其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成員國相比。帕倫勃在書中引用大量的資料證明，如果把中國和其他收入大致相同的國家相比，除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外，中國在政治穩定、行政管理、法制以及控制腐敗等方面的表現都明顯高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準。特別是在諸如社會經濟權利、法律與秩序、婦女權利以及文化權利等方面，中國都取得了相對於其他發展中國家更好的成績。

帕倫勃在第五章中分析了中國在人權問題上為何遭遇雙重標準。他指出，西方國家往往要求中國達到連它們自己都達不到的標準。西方為反對中國試圖保留自身文化與政治傳統，而設定了專門針對中國的規範價值標準，並以這個標準來苛責中國。帕倫勃認為中國遭遇雙重標準的原因有四：一是中國的超大規模更容易吸引注意力；二是源於西方對違反民權和政治權利的強調以及對抗非民主國家的偏見；三是批評中國的人權事務可以用來防範中國、牽制中國的快速崛起，

帕倫勃引用大量資料證明，如果把中國和其他收入大致相同的國家相比，除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外，中國在政治穩定、行政管理、法制以及控制腐敗等方面的表現都明顯高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準。

人權問題服務於美國等西方社會的強權政治目的；四是中國政府自身在人權問題報導上的失誤「滿足」了他人對於中國的誇張想像。作者認為：

認識到中國在人權問題上面臨西方的雙重標準，並非為踐踏人權尋找藉口。應當用更廣闊的、比較的眼光看待中國的人權問題。避免雙重標準有助於緩解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推動中國政府採取更為合作的態度，在更廣泛的領域開展對話。由此，可以在西方國家與中國之間減少對抗性關係，前者正希望與後者通過談判方式達到一種新的力量平衡，以應對中國增長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影響。(帕著，頁182-83)

在第六章中，作者以一個法學學者的身份評價了中國的法制改革。作者認為，中國邁向法治(rule of law)是過去二十五年來中國最大的制度創新之一，唯一可以與之媲美的是向市場經濟的轉變。作者通過大量的個案分析，闡述了法制改革過程的複雜性、其路徑依賴以及改革的政治實質，並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中國法制改革的相對成功證明了一個更務實、更少意識形態驅動的路徑。大量的個案也說明了改革的艱難，以及「為甚麼在發展中國家改革往往失敗」這個問題。作者認為，雖然中國目前正處於改革的重要時期，但是要得出中國處於轉型困境的結論還為時過早。一些東亞國家在發展時期出現了轉型困境，但是另一些國家成功克服了困境。從這些國家的經驗和教訓來看，中

國戰勝轉型困境的道路最有可能的是通過民主化(帕著，頁232)。

帕倫勃也批判性地評價了民主化的種種所謂「益處」。他認為，民主遠不是靈丹妙藥，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當前中國也並不具備推行民主的足夠條件，中國人總體上對政府的表現是滿意的，因為政府可以為他們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發展與利益。中國人普遍相信市場優先於民主。但他也認為這並不意味着中國人不會擁抱民主，而只是因為民主在當前並非緊要議題。他認為在未來的某一天，中國會出現一個民主的「拐點」，就如韓國、台灣等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所經歷過的一樣。

帕倫勃最後認為：「中國即使稱不上完美，但也遠不是最差的，世界不應對中國的成就視而不見。……學習就像一條雙行道，通過學習與借鑒，中國可以做得更好。」(帕著，頁297)

三 中國現代化的「顏色」： 裴著與帕著比較分析

裴敏欣是研究中國問題和中美關係的知名華人學者，現為美國加州克萊蒙·麥金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國際與戰略研究所所長。在這之前他曾是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中國研究項目的高級研究員及項目主任。裴著論證的理論基礎和邏輯起點是新制度經濟學中劫掠型國家理論的觀點，資料來源相當翔實。

帕倫勃認為要得出中國處於轉型困境的結論還為時過早。從東亞國家的經驗和教訓來看，中國戰勝轉型困境的道路最有可能的是通過民主化，但民主在當前並非緊要議題。他認為在未來的某一天，中國會出現一個民主的「拐點」。

中國的民主化是裴敏欣與帕倫勃關注的重點之一。裴氏認為，中國的現代化應該走一條民主政治優先，以制度變革帶動經濟發展的路徑。帕氏則認為，在國家不富裕的階段，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是第一位的，民主是第二位的。

作者曾花費三年的時間搜集資料，這使得裴著對中國轉型面臨的問題分析得相當深刻。但是，裴著存在着下述不足，如作者對中國政治制度改進的積累過於貶低，忽視了中國的政治體制與前蘇聯東歐政治體制的重大差別，低估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取得的成績，也對中國政治精英堅持繼續改革開放的堅定信心沒有充分的認識。

帕倫勃曾任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法學院教授，現為牛津法律、正義與社會基金會 (the Oxford Foundation for Law, Justice and Society) 中國項目負責人。帕著的特點是將中國與同等發展水準的發展中國家對比，也為西方研究中國的轉型增添了一種不同的視角，豐富了比較研究的視野，使得研究較為客觀。同時，作者對於中國現代化的理論觀點與中國政府和很多中國學者的解釋基本一致，較易讓中國讀者接受。但是帕著也存在缺陷，比如對中國社會和政治上面臨的嚴峻挑戰沒有深刻的認識，從而導致對中國民主化與現代化的前景估計過於樂觀。

裴、帕兩著的重點都在於如何看待中國的現代化，但兩人的觀點與看法也許都走上了不同的極端。裴著主要分析了中國現代化轉型面臨的困境，就如同作者的眼中只有硬幣的反面，這使得裴著充滿了中國轉型必然失敗的悲觀主義論調。帕著認為中國現代化成就斐然，在社會經濟、法律與秩序、婦女權利與文化權利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中國的發展是東亞模式的又一次成功。帕倫勃的這些判斷似乎

有些為時過早且過多受中國官方觀點的影響。顯然，他更多地看到了硬幣的正面，顯得有點過於樂觀，從而走上另一個極端。

中國的民主化也是裴敏欣與帕倫勃關注的重點之一，但兩人看法迥異。裴敏欣認為，中國的現代化應該走一條民主政治優先，以制度變革帶動經濟發展的路徑。中國以經濟優先的漸進改革將會失敗，因為它不能解決國家利益與國家代理人的利益之間的差異和分歧。而且，當更深層次的經濟改革削弱統治集團的權力和威脅到他們的生存時，現有政治體系下的經濟改革將不可避免地碰壁^①。裴敏欣認為，只有民主化才能避免中國退化為劫掠型獨裁政權，才能使中國走出轉型的困境。裴後來在《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 雜誌進一步指出：「經濟發展戰略的大變革很可能最終導致政治自由化甚至現有制度的解體——這是共產黨自1989年以來一直竭力避免的。我很懷疑，中國政府是否有足夠的政治勇氣將黨的前途壓上去放手一搏。」^②

帕倫勃認為，在國家不富裕的階段，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是第一位的，民主是第二位的。他指出，「現階段中國的主要議題不是民主而是發展，中國最好的選擇是優先發展經濟，等到國家更加富裕、社會進一步穩定之後再去推進民主化。中國將來的民主化模式是非自由主義的精英民主 (nonliberal elitist democracy)。」(帕著，頁244) 從現代化與民主化的關係來看，帕倫勃的觀點和李普塞特 (Seymour M. Lipset)、達爾 (Robert A. Dahl) 頗為

相似。李普塞特認為，「一個國家愈富有，其將維持民主政治的可能性就愈高」^③。達爾也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水準愈高，這個國家成為民主國家的可能性就愈大^④。

雖然裴敏欣與帕倫勃力圖從不同角度來闡述中國的民主化與現代化轉型，但中國民主化與現代化的複雜性、艱鉅性也許不是一兩本著述可以說清楚的。任何這樣的想法都不免有簡單化之嫌。比較而言，裴敏欣的看法接近躍進民主化，帕倫勃的觀點則傾向於漸進民主化。漸進民主發展的政治前提就是政治穩定，而政治穩定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黨的力量。

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比較各國政治後指出：「處於現代化之中的政治體系，其穩定取決於其政黨的力量」，「那些在實際上已經達到或者可以被認為達到政治高度穩定的處於現代化之中的國家，至少擁有一個強大的政黨。」^⑤中國作為一個典型的後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正處於一個經濟發展、集團分化、利益衝突、價值觀改變和民眾參與期望提高的急劇變化階段，一個強大的政黨和穩定的政治秩序是必需的。亨廷頓進一步指出：「世界上第一個實現了現代化的英國，曾為此經歷過1649年到1832年共183年的時間，美國經歷過從1776年到1865年共89年的時間。」^⑥而中國的現代化如果從1840年鴉片戰爭算起是170年，時間少於英國；如果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算起才60年時間，從1978年改革開放算起僅30年時間，時間少於美國。如果採取一種過於

激進的現代化和民主化方式，可能會遠遠超過中國政治體制的承受能力，導致社會的紊亂。一定要把一個十歲的小男孩催肥成大力士，他是上不了拳擊台的。

對於一名關心中國現代化的讀者而言，裴敏欣的著作會讓你沮喪，但它是發人深省的；帕倫勃的著作會讓你振奮，但批判性不足。不管怎麼樣，上述兩本著作都是近年來研究中國現代化的經典之作，比較而讀之，會讓讀者對中國現代化的困境、成就與出路得出自己的結論。

對於一名關心中國現代化的讀者而言，裴敏欣的著作會讓你沮喪，但它是發人深省的；帕倫勃的著作會讓你振奮，但批判性不足。不管怎麼樣，兩本著作都是近年來研究中國現代化的經典之作。

註釋

① Minxin Pei and Jessica T. Mathews, "Has China Fallen into a Trapped Transition?", 30 March 2006, www.carnegieendowment.org/events/?fa=eventDetail&id=869.

② Minxin Pei, "Looming Stagnation",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100 (March/April 2009): 19.

③ Seymour M. Lipset,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New York: Doubleday, 1960), 31.

④ Robert A. Dahl,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65.

⑤ 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著，王冠華等譯：《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聯書店，1989)，頁377。

⑥ 亨廷頓：〈中譯本序〉，載《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頁4。

祁懷高 上海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 (國際問題研究院) 政治學博士後研究人員